

迈克尔·哈宾博士，《 古代以色列社会异类的社会正义》第 3 部分， 什么是社会正义？

© 2024 迈克尔·哈宾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这是迈克尔·哈宾博士关于古代以色列社会异类的社会正义的教学。这是第 3 部分：什么是社会正义？

Shalom, 我是泰勒大学的迈克尔·哈宾, 我们正在研究古代以色列社会异类的社会正义。

本课程是第三部分, 探讨的问题为: 什么是社会正义? 我们通过研究以色列的文化开始这项研究, 当时上帝将他的律法、摩西五经和土地赐予以色列国,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青铜时代晚期。在我即将发表的《利未记》评论中, 我得出结论, 上帝将书中的材料交给摩西, 为新成立的国家—以色列国提供指导方针, 指导国家如何统一为祭司王国。因此, 这本书分为两个主要部分。

前十章为集体敬拜指明了方向, 以取代亚伯拉罕后裔出埃及之前所遵循的个人和家庭敬拜。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为上帝的子民如何共同生活提供了指导方针, 形成了我所说的国家的社会结构。为了迎接上帝应许给这个国家的土地, 上帝在西奈山颁布了戒律, 如果遵循这些戒律, 就会产生强大的社会结构, 从而在艰难时期维护国家和社会结构。

今天, 我们常常将这些统称为社会正义。虽然旧约中没有使用这个术语, 但这些概念却融入了托拉或上帝所赐予的教义中。当我们回顾旧约时, 在加低斯巴尼亚的民族失败以及随后在荒野中流浪的 40 年之后, 这个国家定居在了上帝所应许的土地上, 就像这张地图上显示的一样。

根据约书亚的记载, 我们发现他们定居在几百个地方, 通常相隔几英里, 他们所在的文化的主要交通工具是步行。交流是面对面的。因此, 在士师时代, 甚至在王国早期, 以色列国实际上是几百个小的、社会上相当孤立的社区的集

合，这些社区部分是由共同的祖先联系在一起的，但更重要的是由出埃及事件的共同经历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对唯一真神的共同崇拜体系，以及关于社会如何运作的共同教义。

在第 1 部分中，我们研究了单个社区的结构，并研究了该结构在社区内产生的一些社会规范。我们在本系列讲座中的目标是从该社会结构中得出原则，然后我们可以将这些原则应用于当今的文化作为社会正义的指导方针。但是，当我在近 15 年前开始研究《旧约》中的社会正义观念时，我发现人们对社会正义的理解有很多不同。

因此，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社会正义一词的含义。根据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说法，社会正义是一个相对现代的术语，显然是从意大利牧师路易吉·塔帕雷利创造的意大利语短语翻译而来 d'Azeglio，1840 年。迈克尔·诺瓦克 (Michael Novak) 同意这一评估，并且两人都认为该术语的定义比较宽泛。

在 2009 年诺瓦克的一次演讲中，他列举了该短语的五种不同用法。他最初的想法是以一种当代形式恢复亚里士多德的普遍正义感。当我们回顾诺瓦克所选取的这些个别事物时，他对其作出了如下定义。

一是分配。这是字典中出现的一个相当普遍的观点，其中社会正义被定义为社会中优势和劣势的分配。诺瓦克反对在分配一词中添加这个术语，因为它似乎增加了一些超人的力量，可以说是有形之手，它负责分配。在建立社会正义方面，这通常被视为一个强大的人类机构，通常是政府。

平等。这涉及优势和劣势的概念。这种观点始于平等是好的，应该得到执行的前提。诺瓦克继续指出，这种观点实际上扭曲了平等的概念，将其与公平、公正或平等分配区分开来。这基本上就是我们看到的画面，当孩子们争论谁的蛋糕最大时，一个孩子五岁，胃口不大，而他的兄弟是一名十几岁的足球运动员。

诺瓦克认为，公平的本质在于给予他人与他人付出的努力成正比的東西一三，共同利益。共同利益的概念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听起来很有价值，但诺瓦克观察到，问题在于谁来决定共同利益是什么。

在古代，小型社区通常是由最聪明、最强大的人来做这件事。在现代治理下，随着现代国家的崛起，诺瓦克认为，这种权力已被官僚国家所取代。而且，负责的人不再是单个人，而是没有责任感的官僚组织。他声称，公共利益实际上是国家全面控制和极权主义的借口。

四、进步议程。诺瓦克认为，进步议程是在工业时代初期欧洲开始从农业社会转向拥挤的商业城镇时发展起来的。

虽然这些并不是第一批工厂，但它们是大规模迁入城市和工业中心工业革命的开端。从本质上讲，进步议程是对文化转型所发生的一切的反应，因为文化转型切断了工人与农场的联系。他们不再种植自己的食物。

他们在工厂工作是为了赚钱买食物。农民和工厂工人都是从黎明工作到日落，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各不相同。在农业社会中，普通农民有家可住，有饭可吃。

他们虽然不富裕，但也不贫穷。由于欧洲社会的性质，他们生活在自己耕种的土地上或附近。在城市里，情况就不同了。

他们完全依赖工资。虽然他们也住在工作地点附近，但生活条件却更加拥挤和不卫生。进步议程的理念是纠正或修正堕落的人类在努力适应新环境时产生的一些错误。

五、同情心。同情心似乎已经成为了任何表面上帮助穷人的行动的口号。这包括几乎所有的现代革命。

诺瓦克说，在过去 150 年里，纳粹、共产党以及非洲和亚洲的独裁者以同情的名义犯下的罪行比历史上任何其他势力都要多，这些独裁者以社会主义为借口为自己政权辩护。引言结束。其中最常见的概念似乎是分配。

诺瓦克使用了字典中对社会优势和劣势分布的定义。这实质上是在流行的网络资源（包括网络资源维基百科）上找到的含义。它以这个定义开始其关于社会正义的文章。

社会正义是指社会中财富、机会和特权分配方面的正义。我发现这与其他地方的定义类似。通过对倡导社会正义的组织进行各种互联网搜索，我找到了这样的定义。

2015年，全国社会工作者协会表示，他们的观点是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平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利和机会。阿巴拉契亚州立大学社会正义与人权办公室的负责人马修·罗宾逊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平等对待和支持人权的权利，以及公平分配社区资源的权利。

这是在此简短定义之前的更广泛讨论。像我听到或看到的许多其他定义一样，通常假设，这三个定义都集中在所谓的权利和机会上。我对这个想法的直接反应是肯定的。

毕竟，正如《独立宣言》所表达的那样，美国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每个人都拥有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然而，更深入的思考提出了几个问题。首先，什么构成了权利？更根本的是，我们可能会问，谁或什么权威将这些权利定义为权利？托马斯·杰斐逊说，这些权利是造物主赋予的。

杰斐逊和大多数开国元勋一样，表达了一种犹太-基督教观点，这种观点实际上直接源于我们将在本研究中研究的同一旧约文本。因此，当代基督徒对此应该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同意我们的权利是上帝创造的世界所固有的。然而，对于非基督徒，尤其是那些自称不可知论者或无神论者来说，这带来了一个问题。

如果生命只是时间和机会的产物，而生命的基础是适者生存，那么人人享有平等权利的观念就与他们的基本前提相矛盾，即每个人都在与其他人竞争以求生存。在进化框架内，不存在权利。第三，当我们的权利发生冲突时怎么办？如果我们假设我们确实拥有权利，无论我们是否承认其来源，那么另一个问题是，当我的权利与他人的权利发生冲突时会发生什么？例如，约翰·洛克发展了罗宾逊的公平分配概念，我们在阿巴拉契亚州立大学简要地研究过这个概念，洛克将一个人的权利限制在他所谓的公平份额内。

他用收集橡子的比喻来说明这一概念，并认为一个人应得的份额只是他或她在它变质之前可以合理使用的东西。超出这个份额的东西就超过了他的份额，引述结束。据我理解，洛克说，如果我们拥有的东西太多，以至于因为不能使用而变质，那么我们实际上就没有权利拥有它。

但基于上述描述，洛克关于橡子公平份额的命题实际上只适用于易腐烂的商品。他说，或者他没有说明如何确定不易腐烂的商品的公平份额。此外，即使对于橡子这样的易腐烂商品，也只有当树木在森林中时，它才有效，因为森林是所有人都可以接触到的。

也就是说，它们是社区资源。如果那棵橡树在我家后院怎么办？如果它结出那么多橡子，我无法在它们腐烂之前使用它们，我是否就失去了使用这棵树的权利？我是否不再拥有隐私权或财产权？如果那棵橡树长到它的树枝垂在邻居的院子上，遮蔽了他的花园，使他的西红柿无法生长，该怎么办？更复杂的是，我的橡树上的橡子掉进他院子里怎么办？虽然我们可以讨论甚至辩论许多问题，但我认为一个明确的观点是，我的权利不是绝对的，不能以牺牲他人的权利为代价。

第四个问题是，机会是什么？我发现很多社会正义的定义都使用机会一词，这很有趣。说所有人都应该有平等的机会是什么意思？此外，我们如何解决平等的障碍？一般来说，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概念，旨在消除阻碍某人从事某项活动或方向的障碍。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通常认为，当个人满足所有条件时，不应存在种族、性别或个人信仰等任意或人为的障碍。然而，有时人为障碍与真实障碍之间的界限很模糊，而如今似乎人们对这一区别感到十分困惑。

生活中的很多方面本身并不是障碍，但它们确实会影响我们的机会。这始于我们的父母是谁以及他们如何抚养我们。这包括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有多少个兄弟姐妹，我们住在哪里，我们在哪里上学，我们上帝赋予的能力是什么，我们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以及我们的善恶是什么。

我们所有人都会面临这样的情况：由于种种限制，我们无法获得想要的机会。举例来说，在马太福音 19:12 中，耶稣提到了各种各样的太监，这些人永远不

会生孩子。耶稣说，有些太监是从母腹里生下来的，有些太监是被人阉的，有些太监是为了神的国而阉割的。

虽然他的观点是，有些人自愿选择不为上帝的王国生儿育女，但有些人因为生来不育而没有生孩子的机会。其他人因为被阉割而没有生孩子的机会。我们如何处理意外事件？除了局限性之外，在我们一生中，还有各种各样的意外事件会消除机会。

无数人因为意外而遭受挫折。正如传道书所说，“跑得快的未必能赢，战士未必能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达的未必得财富，有智慧的未必得恩惠。因为时间和机会会追上所有人。”传道书 9:11。即使我们有机会，并且抓住机会，另一个被忽视的因素就是失败。

仅仅因为我能够抓住机会并不保证我就能成功。在美国，每个人都有机会创业。根据美国小企业协会的数据，大约 30% 的新企业在第一年内倒闭，大约一半在头五年内倒闭。

原因各不相同。虽然在某些情况下，这是意外的结果，但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似乎属于准备和资源的范畴。要么是新主人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来确保他或她确实有一个可行的产品市场，要么是企业家没有开发足够的财务资源来处理建立新企业的成本和经受住通常缓慢的起步，直到它能够独立发展。

高等教育，也就是大学，也有类似的情况。这里的失败率几乎与企业的失败率相同。具体来说，根据美国教育部的数据，几乎一半的大学生在六年内无法毕业。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但一般来说，它们可以归为准备或资源的广泛类别。一方面，学生可能没有为大学学习做好准备，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另一方面，他或她可能缺乏资源，在某些情况下，缺乏经济需求，这可能是一个准备问题。

然而，这通常是由于缺乏意愿或动力，老实说，这是能力问题。很多事情都可能导致失败。一个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的问题是，失败可能是由于错误造成的，通常是道德问题。

虽然道德问题可能不会直接影响工作，但确实会影响性格。在我准备这篇演讲稿时，我读到过一个警长因为挑逗妓女而丢掉工作的故事。即使我们的文化如此匮乏，道德问题仍然很重要。

卡特林的年轻男女永远与成功无缘，甚至因尝试毒品、酒精、非法性行为或各种不当行为而丧命。归根结底，这些社会正义定义和许多其他类似的定义似乎代表了我所说的社会正义的残缺概念。第一个定义是公平份额是什么？我们没有定义公平份额，那么我们如何知道我们得到了它？理论家们似乎支持公平份额概念的优先性，但对于公平份额的构成存在很多分歧。

事实上，这个词几乎总是与权利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它涉及我身处社会所获得的好处。我们可以就此进行很多讨论，自从我开始探索这个问题以来，我一直在不断地思考这个问题，不仅在理论和文化应用方面，而且在我自己的生活方面。

我的应得份额是多少？比较的基础是什么？这真的没有很好的定义，而且对于我的公平性应该是多少也没有达成一致。虽然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推动平等的理念，但坦率地说，其中很大一部分似乎来自嫉妒和贪婪。那些不这样做的人会憎恨那些这样做的人。

而那些确实这样做的人则对他们认为试图夺走他们所拥有的东西的行为感到不满。此外，这个定义很模糊。让我们回到我们的定义。

我们通常如何描述实物商品？分配有点模棱两可，因为它可以被动使用，也可以主动使用，而且经常混淆需求和欲望。分配的被动定义或使用可能暗示随机分散。一个例子可能是霰弹枪爆炸中弹丸的分布。

就社会公正而言，它反映了优势或劣势的分散，一个人拥有什么完全是偶然的。本质上，这些都是一个人无法控制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可以想想一个人天生的能力或缺陷，或者一个人出生的环境。

积极分配的使用表明，一个人一生中得到的优势或劣势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其出生状况的结果。它可能是社会力量的直接推动力，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社会正义文献通常以后者的意义使用该术语，并试图改变社会力量来纠正不平等。

正如诺瓦克所描述的，大多数人认为分配是一个社会或文化分配商品和服务的过程，这意味着一些超人的力量或看得见的手在做这项工作。也就是说，有一些非常强大的人类机构，通常是国家。虽然优势和劣势都是因素，但现代讨论通常集中在劣势上，而许多社会正义努力似乎通常是一种有意抵消先前分散并人为纠正劣势的尝试。

然而，最近，人们公开地试图利用社会力量来消除优势，无论这些优势来自何方。这一原则被截断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只提到了我应该得到什么。我认为，它忽略了我应该给予什么。

现代正义还有另一种被削弱的方式。这就是分配问题的根源。马修·克莱顿和安德鲁·威廉姆斯在他们关于社会正义的教科书的导言中给出了一个更广泛的定义，既包含了优点，也包含了缺点。

他们说，当决策影响到不同个人或群体之间的利益和负担分配时，就会出现最广泛意义上的社会正义问题，我加了斜体。因此，真正的社会正义不仅包括财富、机会和特权，还包括财富的创造、所涉及的危险以及社会中的责任。另一种说法似乎是，社会正义的基本概念源自两个问题，每个人都应该问这些问题，应该经常问这些问题，也应该着重问这些问题。

首先，我是否得到了应得的份额？这就是好处。其次，更重要的是，我是否承担了应得的负担？第二个问题常常被完全忽视，尽管从历史上看，它一直是理解一般正义的基本素质。事实上，直到最近几百年，这两个问题似乎在历史上一直被同时提出，因为一个人应得的份额可能因他承担的负担而异，反之亦然。

用耶稣的话来说，凡是多给谁，就向谁多取。这是在路加福音 12:48 中。在后来的历史中，人们用法语表达“noblesse oblige”来描述这一点。

甚至卡尔·马克思在发展共产主义时似乎也曾持这种观点。正如他所问，他在书中、作品中以及对哥达纲领的批判中的经典语句是，提出了公平分配是什么的问题，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他的回答将公平分配与平等劳动问题以及每个人的公平负担问题联系在一起。

此外，当我开始问我的妻子我的应得份额是多少时，我的观点混淆了需要和想要。我们开玩笑，特别是当我可能会说“我需要一块馅饼”这句话时。她看着我，需要吗？我必须限定它吗？当马克思发展他的概念时，他声称，只有当他所谓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发展起来时，当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工人时，这种理想才会出现。

虽然不清楚他的意思，但似乎暗示经理们没有工作。在此期间，平等分配和集体所有权的理念被当作标准，这忽略了能力方面，即我的公平负担。这又是一个截断的观点。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进步观点。其假设是，如果我们没有私有财产，那么我们会消除贪婪，而贪婪被视为压迫如此多群众的根源。但这是基于一种非常幼稚的人性观。

无论人们是持《圣经》观点还是进化论观点，都是幼稚的。《圣经》的观点认为，人类堕落了，具有以自我为中心的本性，与上帝和人类同胞相冲突。进化论的观点认为，人类在为成为最适者而战，从而生存下来，在这个过程中，人类表现出以自我为中心的本性，与人类同胞相冲突，没有上帝的容身之地。

那么，贪婪就是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强烈体现。贪婪不只是富人才有的。我们所有人都有。

当我们开始说出“我的”这个词时，它的存在就变得显而易见。虽然马克思和他的追随者主张公有财产，也就是说，没有人拥有任何东西。不幸的是，现实

是，正如俗话说，如果每个人都拥有它，那就没有人拥有它。也就是说，没有人会照顾它。

从本质上讲，集体所有制和私有财产的丧失实际上导致了公平份额的丧失，因为它消除了人们尽最大努力工作的动力，结果就是所有人都受苦。这是我们清教徒祖先（美国第一批定居者）从惨痛经历中学到的教训。当普利茅斯种植园首次定居时，它因共同的路线和条件而萎靡不振。

正如总督威廉·布拉德福德在普利茅斯基金会的工作中所描述的那样，他们认为，夺走财产并将社区纳入联邦将使人们幸福和繁荣，好像他们比上帝更聪明一样。然而，他们却挨饿。当他们放弃这种结构并给每个家庭自己的一块土地时，殖民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为它让所有人都非常勤劳。

正如大卫·巴顿在他的著作《美国故事：开端》中指出的那样，这些惨痛的教训对于我们国家的建立至关重要。与马克思不同，约翰·洛克认为，私有财产作为劳动的产物，应该是劳动的产物。与马克思一样，洛克也认识到贪婪的问题，但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

他建议限制。他认为我的份额只是在变质前我能合理使用的部分。超出这个范围的部分就超过了我的份额。

这听起来不错，但它引发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当我们看这一点时，我该如何处理剩余产品？当一个人的劳动生产出的产品超过他可以使用的产品时，我该怎么办？洛克用收集橡子的比喻，声称多余的橡子会留给别人。如前所述，这只适用于生长在树林或类似来源的树木，因此这种类比很难转化为劳动生产多种商品的复杂经济体系。

此外，在采集橡子时，如果够了，人们可以停止采集。剩下的橡子会放在树下，其他人可以自由地捡拾它们，或者被松鼠捡拾，或者它们会长成一棵新的橡树，或者它们会腐烂。在复杂的经济体系中，人们不能轻易停止自己的劳动。

洛克在他的论述中忽略了另外两个因素。首先，他没有考虑到保存是为了长期提供……让我们看看，我们在哪里……盈余，长期供应季节性商品。第二个因素是，收集橡子的人实际上并不生产它们。

它们自然生长在橡树上，正如诗人所说，只有上帝才能创造一棵树。由此推论，上帝是给予资源的人，当我们进入旧约的社会正义概念时，这将是第一个前提。首先，上帝是唯一的创造者。

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是由他创造的。圣经的观点是，我们是他所创造的事物的管家或管理者。当我们看创世记 1 至 3 章时，我们会看到两个关键事实，它们构成了这一讨论的基础。

在创世记 1:28 至 30 中，上帝宣告新造的人类（根据创世记 2，只有两个人，一男一女）要繁衍，遍满全地，与同伴一起管理。他们要集体治理整个地球。这里的希伯来语可以解释为，人类要管理整个世界。

第二个事实是，创世记 2:28 指出，这对原始夫妇被安置在上帝种植的花园中。这个花园的地理位置非常有限，在某种程度上与其余的受造世界有所区别。考虑到两个人的局限性，两个步行的人，我认为与世界相比，它很可能非常小。

从本质上讲，人类亚当和夏娃以及他们的后代将成为共同创造者，因为我们要把上帝创造的美好世界变成一个全球花园。因此，作为某些资产的管理者，然后对于以色列来说，在堕落之后，上帝在西奈山对这个国家的指示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这个过程。以色列国将进入上帝赐予他们的土地，成为一个祭司王国，成为其他国家和上帝之间的调解人。

在此过程中，他们要成为上帝赐予他们的土地的管家或管理者。《旧约》强调，以色列人个人并不拥有土地。他们耕种的土地，他们拥有的土地，不是他们的。

正如我们在本系列的第一部分中提到的，每个大家庭都有一部分土地由他们管理，只有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才拥有这片土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我们

学习《托拉》时，我们看到了人们共同生活的指导方针，以便每个人都能充分享受生活。本质上，我们谈论的是企业和个人的社会正义，目的是防止社会不公。

也就是说，它提供了旨在防止社会不公发展的指导方针，记住每个进入土地的人都将获得可用于耕种的土地。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搬进去并立即开始耕种。显然，每个家庭收到的土地数量足以养活他们。

但同时，这也是大家庭可以轻易做到的，不多不少。《摩西五经》尤其是《利未记》为社区生活提供了原则，如果遵守这些原则，即使不消除，也肯定会减轻社会不公。此外，文本还提供了如何实施这些原则的例子。

但《托拉》也提供了重要的补救措施，旨在纠正与当时社会和经济制度密切相关的不公正现象。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托拉》提出其原则的方式强调了“我是否遵循了公平的负担”的问题。这体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旧约》明确指出，以色列民族中的个人，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全人类，并不平等。无论是就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地位还是自然能力而言。用罗尔斯的术语来说，这些要么是社会运气（我的家庭地位），要么是自然运气（我的自然能力）。

但是，《旧约》并没有将这些差异视为随机的、抽奖的概念，而是将它们与一位至高无上的、全能的上帝联系起来，例如在诗篇 139 和以赛亚书 44 中提到的内容。因此，《旧约》的标准似乎是，当存在不同的期望时，他们对个人的负担取决于这些不同的因素，而不是制定旨在抵消地位或能力差异的指导方针。本质上，期望是个人拥有特定的能力或地位，以造福社会。

祭司的职分或许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以色列国，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当祭司。祭司的职分仅限于利未支派，这是一个家族地位的问题，他们被赋予照管圣幕及其所有设备的责任。

《民数记》第 1 章和《民数记》第 8 章都阐述了这一点。但并非所有利未人都可以成为祭司，即负责祭祀的特定人员。虽然不是绝对清楚，但《出埃及

记》第 28 章和《利未记》第 8 章似乎表明，实际的祭司职位仅限于亚伦的男性后裔。可悲的是，可拉是哥辖族的利未人，负责维护圣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但他对自己的角色并不满意，并要求成为祭司的一部分。

因为他的叛乱，他和那些支持他的人都被大地吞噬，最终死去。还应该注意的是，牧师的生活标准更高，负担也更重。例如，牧师不能娶离婚妇女或寡妇。

此外，祭司们被要求在安息日工作，而不是将其作为休息日。鉴于这一背景，耶稣在才干比喻中所说的“各尽所能”这句话对犹太听众来说并不奇怪。从圣经的角度来说，对能力的正确评价似乎是基于上帝的。

也就是说，我拥有的任何能力都是上帝赋予的，他期望我在我所处的文化中运用这些能力，为他带来荣耀。这在今天极不受欢迎，因为人们认为，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忽略我受孕时 DNA 决定的甚至基本的物理特性。第二个观察结果是，在旧约中，成功和失败既被视为集体的，也被视为个人的。

团体和个人的成功取决于两个因素。首先，与上帝保持正确的信任关系，并正确使用上帝给予个人的一切。撒母耳记上在这方面分别对比了以色列的前两位国王扫罗和大卫。

扫罗被视为一个不真正理解上帝的人，因此，他没有使用上帝赋予他的能力。他早期的失败之一就是与歌利亚的对抗。作为国王，他本应在这种冲突中代表国家。

相反，他磨磨蹭蹭，然后让年轻人大卫接替他的位置。最终，扫罗失败了，在战场上自杀。相比之下，大卫被认为是合神心意的人，尽管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他被认为是以色列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王。

从集体角度看，《旧约》的观点似乎是，如果国家中的每个人都确实信奉上帝，拥有集体信仰，并做好自己的工作和集体工作，上帝就会集体祝福这个国家，每个人都会分享集体祝福。我发现这与德沃金的观点相反，德沃金认为运气是决定结果的关键因素。当我们审视这些问题时，我们需要记住，《旧约》

也反映了一个堕落的世界，有缺陷、有罪的人类在这个世界里挣扎，遇到的问题无法用简单的罪恶观来解释。

也就是说，并非每一次失败都被视为个人失误的直接结果。我们已经注意到，《约伯记》非常有力地指出了这一点，约伯，一个被所有人劝诫为义人的人，却面临了无法估量的损失。今天，我们看到了类似的问题。

建筑物倒塌、风暴肆虐、工具损坏、动物死亡、人们生病或受伤，所有这些似乎都发生在最不方便的时候。最终的结果是，人们并没有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努力而繁荣，但正如传道书所说，时间和机会会降临到他们头上。正因为如此，旧约中的社会正义概念虽然始于每个人都需要承担自己应尽的负担这一前提，并因此强调规范正义，但也承认事情会发生，每个人并不会从自己的劳动中获得他们所期望的回报。

生活并不公平，这是对这个问题一个很好的描述。因此，《托拉》制定了我们所谓的安全网，旨在帮助那些在生活中遭遇意外悲剧的人重新站起来。由于社会结构的原因，我们称这些人为社会异类。

许多安全网和安全线都交织在《托拉》的具体规定中，但我们将在第四部分介绍这些规定。

这是迈克尔·哈宾博士关于古代以色列社会异类的社会正义的教学。这是第 3 部分：什么是社会正义？